

教育部重点推荐大学文科教材

◎ 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

中國文學史 新著

申卷

Zhongguo Wenxueshi

Xinzhū

(增订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文

教育部重点推荐大学文科教材

培恒 骆玉明 主编

中國文學史 新著

中卷

Zhongguo Wenxueshi

Xinzhu

(增订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7-309-05462-0

I. 中… II. ①章…②骆… III. 文学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4989号

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贺圣遂 杜荣根 韩结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96.75

字数 1735千

版次 200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书号 ISBN 978-7-309-05462-0/I·382

定价 108.00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在描述中，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性的发展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体裁、叙事方式、由各种艺术手法所构成的相关特色等）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进行相应的艺术分析；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原则，伴随必要而审慎的考证，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以探寻和抉发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向的改变。此书虽然充分吸收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优点，但却已是一部新的著作。

目 录

第四编 中世文学·分化期

概说	3
第一章 文学分化的开始与中唐诗文	13
第一节 杜甫	13
第二节 经历安史之乱的其他诗人	33
第三节 诗坛的新生代	43
第四节 韩愈、柳宗元及其诗文的异途	55
第五节 元稹、白居易诗的两重性	72
第六节 李贺及其他	81
第七节 唐代的女诗人	94
第二章 体现新倾向的唐代俗文学与传奇	101
第一节 俗赋和《游仙窟》	101
第二节 变文、讲经文与词文	105
第三节 唐代的话本	108
第四节 唐代的传奇	111
第三章 晚唐诗歌的演进与诗文分化的缓解	128
第一节 杜牧与许浑、张祜	129
第二节 李商隐与温庭筠	134
第三节 晚唐前期的其他诗人	139
第四节 韦庄、韩偓等晚唐后期诗人	142
第五节 司空图的诗论	153
第四章 词的兴起及其任情唯美的倾向	155
第一节 词的起源	155
第二节 唐五代民间词	156
第三节 唐代的文人词	159
第四节 西蜀词人	164
第五节 南唐词人	167

第五章 词在北宋的繁荣 ·····	172
第一节 李煜及宋初的词·····	172
第二节 柳永、晏殊与张先·····	178
第三节 从六一词到东坡词·····	187
第四节 秦观、周邦彦及北宋晚期的词·····	196
第六章 北宋诗文的重道抑情倾向 ·····	209
第一节 北宋前期诗文的趋时与复古·····	209
第二节 欧阳修与诗文“宋调”的形成·····	221
第三节 曾巩、王安石和苏氏兄弟·····	232
第四节 江西诗派及其他·····	249
第七章 南宋诗词的衍化 ·····	260
第一节 两宋之交的诗词与李清照·····	26
第二节 陆游及其同时代的诗人·····	272
第三节 辛弃疾·····	288
第四节 永嘉四灵诗和白石道人词·····	297
第五节 江湖诗派、《沧浪诗话》及其他·····	305
第六节 从梦窗词到玉田词·····	311
第八章 宋代的俗文学及志怪、传奇的俗化 ·····	322
第一节 杂剧·····	322
第二节 “说话”·····	325
第三节 志怪、传奇的俗化·····	327

第五编 近世文学·萌生期

概说 ·····	333
第一章 作为近世文学发端的金末文学 ·····	344
第一节 辽以来文学发展的回顾·····	344
第二节 元好问及其他·····	347
第三节 《西厢记诸宫调》·····	353
第二章 元代的杂剧 ·····	361
第一节 元杂剧的体制·····	361
第二节 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创作·····	365
第三节 白朴的杂剧创作·····	376
第四节 马致远的杂剧创作·····	381

第五节 王实甫与《西厢记》·····	385
第六节 元杂剧第一期其他作家·····	393
第七节 郑光祖和元杂剧第二期作家·····	398
第三章 元代的南戏 ·····	405
第一节 南戏的兴起及早期剧本《张协状元》·····	405
第二节 《琵琶记》·····	412
第三节 《拜月亭记》及其他·····	419
第四章 元代的散曲 ·····	425
第一节 由金入元的散曲作家·····	425
第二节 散曲的精致化·····	434
第五章 近世文学萌生期的小说 ·····	443
第一节 中短篇话本·····	443
第二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	450
第三节 《水浒传》·····	459
第四节 文言小说《娇红记》·····	467
第六章 近世文学萌生期的诗文 ·····	473
第一节 元初的诗文创作·····	473
第二节 诗坛新风的形成·····	476
第三节 元诗的高峰与殿军·····	485

第 四 编

中世文学

分化期

概 说

中国文学自建安至唐玄宗时期,在总体上是沿着文学自觉的途径、本着美的追求的精神发展过来的。其间虽有梁裴子野作《雕虫论》,对美文学加以攻击,但影响不大;北周的苏绰、隋代的李谔力图改变文风^①,也没有达到目的。到了唐代,陈子昂否定齐梁诗歌的“彩丽竞繁”,倡导“复古”,但他标举的“汉魏风骨”,其实是建安、正始乃至太康时期左思的诗歌传统,并没有违背建安以来的文学发展道路。而自中唐时期起,文学就开始分化,明显地出现了两种足以对峙的倾向;当然并非在任何时期都势均力敌。

一种倾向是把文学作为政治、道德的附属品或工具,而其所坚持的政治、道德的指导原则则是儒家之道。中唐时期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白居易要求诗歌的“风雅比兴”(《与元九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倾向。到了宋代,其声势更盛。周敦颐主张“文所以载道也”(《通书》二十八),邵雍认为作诗需把“情累都忘去”(《伊川击壤集·序》),就显然比柳宗元、白居易走得更远。这些在文学创作中都有相应的体现,唐代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宋诗的感情薄弱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生动的例证。另一种倾向则是建安至唐玄宗时期的文学主流的继续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在这方面不但有诗文,也有传奇、讲唱文学和新起的词。后者成为宋代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门类;尽管到了南宋,词的任情唯美倾向有所减弱。换言之,自中唐至南宋末期,一方面是文学的分化,另一方面是文学仍在前进。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分化中的前进。

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中世文学的分化期。

城市经济的繁荣与理学的兴起

上述文学局面的形成,除了文学自身的原因(这在本编各章中将予以具体

^① 分别见《周书·苏绰传》、《隋书·李谔传》。

说明)外,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素。

南北朝时期虽长期分裂,但双方经济都在增长。不但农业,工商业也在逐渐繁荣。与此相应,则是富庶的城市的扩展。隋唐的经济就是顺着这个势头向前推进的,虽然在这过程中又经受了隋末大动乱和安史之乱等波折。

在唐玄宗时代,全国已有了许多富庶、繁荣的城市。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跋扈虽然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那主要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基本未受影响,经济仍不断壮大,并承担了唐王朝的绝大部分赋税;所以中唐时期的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送陆歙州诗序》)扬州和益州(今四川成都)成了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有“扬一益二”之称(见《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到了唐末和五代时期,扬州虽也遭到破坏,但就总体来说,“南方及华东经济却在发展,局部区域经济正在兴起。……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不仅是小农经济,而且是商业;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唐代,主要是由于这些东南各省区域经济有新发展所形成”^①。

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更胜唐代。在北宋中期,处于江南的城市杭州,已是“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望海潮》)。至于首都汴梁的富丽,更是甲于全国。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其于北宋末的情况说:“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桥,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但杭州在作为南宋的首都后,其规模又非北宋汴梁可及。《都城纪胜》载,南宋末年,杭州的户数达到“仅百万余家”^②,这虽可能有些夸张,但几十万户总是有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绝不是只靠政治力量就能形成的,必须有发达的商业、手工业和文化娱乐设施相配合。有关这些方面的情况,《都城纪胜》和《梦粱录》都有较具体的记载。

与此相应,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杜佑在唐代中期说:“……其后仕宦途多,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他技。”(《新唐书·突厥传》)农业人口的减少实已到了极为突出的地步。又,宪宗元和六年中书、门下奏:“国家自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使者八十余万,其余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则是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旧唐书·宪宗本纪》)其所估算的农业人口虽较杜佑所估算的为多,但僧道、商贩、色役等既占到十分之五六,则其中商人及手工业者

① 见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② “仅”是几乎、接近之意。

的人数即使仍少于农业人口,当也不至相差很大。总之,从唐代中期起,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人数必然增加颇多,这也正是城市得以发展的基础。

宋代的经济比唐代更为发展,光就海外贸易来说,南宋“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①,而杭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自建炎二年(1128)至绍兴四年(1134)间每年“收息钱九十八万缗”^②,占政府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说:“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依办海舶,收入固不少。”这都可以反映其工商业的总体水平,而其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人数较之唐代当亦只多不少。

城市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虽然加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联系,但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个人来说,却获得了较多的活动空间(甚至作为个人的农民也增添了谋生的途径),其个人意识自必相应增长,群体对个体的束缚不得不相应放松。同时,以经济为杠杆,享乐生活和享乐意识也大为发展起来。这一切,对于文学的较无束缚地抒发个人感情,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但另一方面,这对于封建秩序却起着腐蚀作用;就当时经济的基本方面来说,还是封建经济。因而,有害于封建秩序思想和行为是与当时制度相矛盾的。加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其后的藩镇的跋扈无论给唐王朝的统治还是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于是,从思想上维护封建秩序和排斥异端就成为深具现实意义的迫切任务。宋王朝建立以后,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达,由生产发展所导致的对封建秩序的腐蚀作用有增无减,少数民族所建立的辽、夏等政权的力量又对宋政权形成强大的压力,上述的思想要求就更具有迫切性。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武库中,在这方面最能起作用的是儒家思想。但自建安以来,它一直未能再恢复到汉武帝时期所开始树立的辉煌地位。隋、唐虽然分别采取了一些提高儒家思想地位的措施,但并未产生巨大的效果。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令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二年(651)又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加以考证,似乎对儒学非常重视;在完成以后,又于永徽四年宣布:“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旧唐书·高宗本纪》)。而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明经科却又很受轻视,远不能与进士科相比^③。所以,此等盛举远不能改变局面。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数十年,遂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等致力于儒学复兴。这不是一种官方行为,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中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国初至绍兴天下岁收数》。

② 同上书卷十五甲集《市舶司本息》。

③ 见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第84—85页。

一批热衷于挽救统治危机的人们的主张。它在当时就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到晚唐五代虽一度消沉，但到宋代则以理论更为周密、气势更为盛大的形态出现，形成了理学。尽管在宋代倡导理学的并非大官僚，理学也曾一度受到官方排斥，但在地主阶级的士人中却有广大的信徒。同时，宋王朝从真宗时期起大力提倡儒学。真宗一即位，就下诏访求孔子嫡孙，不久找到了孔子的四十五世孙，任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次年，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以左丘明等十九人配享孔子庙，加封爵；同年，正月“庚午诏，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已镂板文集令转运司择官看详，可者奏奉”；三年七月己亥，“诏南宫、北宅，大将军以下各勤讲肄，诸子十岁以上并受经学书，勿令废惰”(以上皆见《宋史·真宗本纪》二)。对儒家思想不仅正面宣扬，而且辅以思想统制的手段，儒学之得以在思想领域取得统治地位，自非意外。这也就给理学——儒学在当时最切合实际需要和具有最高理论水平的一个派别——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换言之，自唐代韩愈等开始的振兴儒学的努力，至宋代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不过，社会既已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就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用先秦的儒家思想来解决当时的问题了。所以，韩愈、李翱等人都希图对原有的儒家思想作若干改造。李翱的见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人性都是善的，但却为情所累，“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上)。为此，他主张去情而复性，但“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必有渐也”，所以，他要人首先“斋戒其心”，做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进而达到“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的境地(《复性书》中)。被他作为“复性”的必不可少阶段的“斋戒其心”，实源自佛道两家。他把韩愈的儒、法结合改成了儒与佛、道结合；这再一次证明了单单依靠儒家思想已不能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

宋代的理学虽有不同的派别，但以北宋的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和南宋的朱熹(1130—1200)为代表的一派影响最大，通常称为程朱理学。由南宋的陆九渊(1139—1193)与其兄陆九韶、陆九龄(1132—1180)倡始的一派在明代虽然声势很盛，在宋代却无法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实际是由李翱的复性去情说发展而来。其所谓“天理”，就是李翱的所谓“性”，但在论证“性”即“天理”的体现这一点上，较充分地显示了思辨哲学的特色；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新的进展，也可说是中国自然科学进展的曲折反映。其所要去的“人欲”，虽不似“情”的笼统，但也有其相通之处。因为，李翱之反对“情”，就是由于从“情”出发的欲求有可能破坏社会规范；而程、朱所否定的“人欲”，则正是一切与当时的社会规范相反的东西。

程朱理学在宋代虽非官方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在宋代受到官方的积极支

持,而作为儒家思想中一个派别的程朱理学,要求人们通过普遍的自我调节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定,并为此提供了一整套的论据和实践的步骤,又正适合当时的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因而在士大夫中获得强烈的反响也正是十分合理的事。

由此,在中唐至宋末的漫长时期里,一方面,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日益壮大而来的市民意识对文学(以及从事文学活动的士大夫)的影响必然日渐加深,但另一方面,随着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形成而来的儒家思想对士大夫和文学的影响也必然会愈益加强,这就形成了文学上的较为明显的、同时又是处于错综复杂的态势的分化。

这种分化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俗文学的兴起与雅、俗文学的互为影响;第二,雅文学本身乃至士大夫作者自身的分化。

俗文学的兴起与雅俗文学的互为影响

在唐代以前,本就存在着出于民间的文学作品。以汉代而论,即有民间乐府与俗赋。但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均不能与唐、宋的俗文学相提并论。因为,汉代的俗赋固然长期未曾受到重视,就是汉代乃至南朝的民间乐府,与士大夫创作的诗歌相比,也始终处于附庸的地位。但元、明两代最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却是关汉卿等人的杂剧和被称为“四大奇书”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以及汤显祖的《牡丹亭》;而元杂剧与“四大奇书”皆属于俗文学的范围,《牡丹亭》的体裁——传奇也由俗文学的南戏演化而成。因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俗文学在元、明已由附庸而成为主流。作为当时的杂剧和通俗小说的滥觞的,则是唐、宋的俗文学。由此也可说明唐、宋的俗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至其所以如此,乃因唐、宋的俗文学主要是适应市民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市民在社会上的日益壮大,这类文学也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并扩展其影响于士大夫阶层;当然同时也从士大夫的文学中吸取营养。

唐、宋的俗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是虚构性的通俗叙事作品。大致说来,这些作品均以叙述故事为主,全部或基本出于虚构,以情节及叙述的趣味性来吸引读者;至其体制,或为俗赋,或为骈文,或诗文间杂,或纯属歌诗。此类作品,绝大部分保存于敦煌石窟,一度曾被泛称为敦煌变文,似乎并不确切^①。它们

^① 例如,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六位先生联合编校的《敦煌变文集》,是一部对研究敦煌保存的此类俗文学作品很有贡献的书;而书中所收,恐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称为变文。参见本编第二章。

的产生时代,由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来,最早的不迟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最晚的当在唐代末期甚或宋初。中唐时期兴盛起来的传奇——属于雅文学的文言短篇小说,显然受到它的重大影响。

唐代的这种虚构性的通俗叙事作品,就是宋代“说话”的前身。但宋代“说话”又曾较多地从唐传奇吸取养料。虽然现在已无法看到宋代“说话”的面貌,但元、明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是宋代“说话”的后裔,则为研究者所公认。而这两部作品中所出现的对欲望等的强烈追求,在唐代的虚构性通俗叙事作品和传奇中已开其端。

在虚构性的通俗叙事作品之后出现的另一类型的俗文学,是唐、五代的民间词。在敦煌石窟中也保存着很多这类作品。以抒情为主,也间以叙事。文词虽多质俚,而不少篇章均能直写其所见所感,较少掩饰,故能真实地显示出普通人的追求和哀乐,具有感人的力量。其中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词三十首,朱祖谋曾予刊行,评为“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彊村遗书》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其他的敦煌词,也多可作如是观。而五代、北宋的文人词则基本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其所写的,大抵为日常生活的悲欢,包括男女之情和对生命及美好的往日迅速流逝的慨叹,其中隐隐体现出对于自我的执着。北宋虽是儒家思想复兴的时代,但北宋的文人词仍颇为大胆,不像北宋诗的小心谨慎^①。这大概与北宋人将词视为小道、并不把词编入自己的文集有关。因此,词人不必多所顾忌,他们努力追求的,在于真切而细腻地表现出内心的感受,其艺术成就又迥出于敦煌民间词之上,所以宋词能与唐诗、元曲并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独绝之作,而北宋词又较南宋为优,致使王国维《人间词话》为“北宋风流,渡江遂绝”而感慨。这恐怕与南宋人对词的重视超过北宋、开始把词编入自己的文集不无联系。陆游在为其自编的词集所作《长短句序》中说:“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其实,陆游的词不但没有北宋柳永的大胆,也不如秦观的洒脱,但他却已经要作自我检讨了。从这里也正透露了南北宋词变迁的消息。

① 这里举一个例子。《王直方诗话》的《少游和参寥诗》条载:秦观曾有一诗和参寥,其末两句为“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孙莘老读此诗至末句,云:‘这小子又贱相发也。’少游(秦观)后编《淮海集》,遂改云:‘经旬牵酒伴,犹未献《长杨》。’”此诗收入秦观《淮海集》卷七,题为《辇下春情》,末两句是已经改过的。“平康”为伎女聚居之处,原来的那两句明显地表示出他与伎女之间有交往。虽然当时一般伎女都会歌舞,有的并能写诗词,与她们来往的并非都是所谓“嫖客”,但把这样的内容写入诗中仍应受到指责,所以秦观不得不把它改为冠冕堂皇的“犹未献《长杨》”,尽管从原来的与伎女交往一变而为想向天子献赋未免有点突兀而滑稽。但在秦观的词中,却有不少涉及伎女和赠伎女之作,根本用不到掩饰。

继唐、宋词而出现的宋代(包括金代)另一种俗文学体制为曲,在南方的为南曲,北方的为北曲,它大抵渊源于唐、宋大曲(一种大型乐舞)、词和当时当地的民间曲调(南方或北方的民间曲调)。曲和词的体式相近,但在字数定格上较为自由。同时,曲可以把同一宫调的两支或多支曲子(宫调虽异,但管色相同的曲子也可),在使用同一韵的前提下构成一个表情达意的单位,称为套数;就此点而言,其内容的含量就较词为丰富。在宋词已以雅文学的面貌流行时,曲仍为俗文学的一种。但由于上述的特点,它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到后来又进而将不同宫调的许多套数也按一定的规律联结起来,并杂以说白,演唱故事,称为诸宫调。由此,曲就不但是抒情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又兼具较大规模的叙事功能了。在这基础上,曲又与唐、宋(包括金代)的戏剧^①相结合,演进而为剧曲:在北方的为金、元杂剧,在南方的为南戏。北方的杂剧可能在金代就已产生了杰出的作品,但由于现知的金代杂剧作家都生活到元代,并已难以区别其哪些作品写于金代、哪些写于元代,所以只能一并放到元代部分去叙述;南戏在宋代虽尚处于稚拙的阶段,其剧本也全部没有保存下来,但在元代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明代更成为当时的主要戏剧样式——传奇——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诸宫调还是金元杂剧、明代传奇,都是虚构性的叙事文学,从而都自唐代俗文学的虚构性叙事作品、唐传奇和宋、元“说话”中吸收了养料;同时,它们又都是以曲子来为作品中的人物抒情的,在这方面,自唐、五代直至宋代的词在述事抒情上的高度成就又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借鉴。

总之,由于唐代的俗文学的兴起,一方面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宋代以后的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发达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条件。而如同我们在下一编中将要指出的,就作品的成就来说,中国近世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乃是通俗小说和戏曲。所以,唐代及其后的俗文学对于我国文学由中世进入近世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唐、宋的俗文学对当时雅文学^②的分化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我们在下文将要涉及的内容。

雅文学的分化及其走向

从中唐时期起,中国的雅文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大致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继续注重自我、追求艺术的美,并不断演进;另一种是注重群体,抑制自

① 主要是宋杂剧、金院本,参见本书第五编。

② 自本编起,为了与日益繁盛的俗文学相对照,我们有时将使用“雅文学”一词。这只是为了表明其与俗文学的区别,并无褒贬之意存于其间。其所以不用“文人文学”的名称,是因为俗文学的很多作品也出于文人之手。

我,有时并否定艺术的美。

在诗歌中,杜甫本是体现第一种倾向的杰出诗人,他在安史之乱以前所写的诗,无论是述说个人的痛苦或民众的不幸都无所遮隐。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所写,就有为了国家利益而控制自己感情之处,甚至自欺欺人。及至时局稍稍平定,他又回到了原先的道路,只是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因此,从中唐开始形成的这两种不同倾向,最早是在杜甫身上同时体现出来的。

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诗歌的重视自我,主要是赞美自我的价值、尊严,勇敢地抒写自己在现实中的感受,歌唱自己所认为的美,倾诉个体生命流逝的悲哀等等;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诗歌的重视自我,却有了一种新的倾向:显示个体与群体的疏离。而且,这种倾向越到后来越加突出。这是由于士大夫既对政治现实的失望日益严重,对社会无法保护个人——大批惨罹浩劫的个人——而引起的不满渐趋强烈,但当时的环境又使士大夫不得不抑制自己对作为群体代表的唐王朝的怨愤和抨击,就只能采取疏离的态度了。此种倾向即以杜甫的诗为滥觞。《佳人》诗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这以后,体现前一种倾向的唐代诗人,大抵是沿着此一路径走下去的。那些真正有特色的诗篇,便是挖掘各种与群体相疏离的心灵的隐秘之作;即使是写景诗,其中所渗透的情绪也是其独特的心灵活动的折射。因此,就总体来说,中、晚唐的优秀诗人的个人特色更为鲜明,李贺、李商隐等是尤为突出的代表。另一方面,由于与群体的疏离,纯粹个人的东西的重要性就越来越突出,爱情——个人的情欲^①——在诗歌中也就越来越显赫;当然,这同时又与城市的繁荣、市民的兴起而导致的在男女关系上的某种松动状况有关。不过,因为上述的个体与群体疏离的倾向并不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唐代中后期的爱情诗也大都缠绵悱恻,缺乏奋发的追求。

较集中地体现后一种倾向的唐代诗人,是元稹和白居易。他们要求诗歌体现儒家诗教的“风雅比兴”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要使诗歌为政治、伦理服务。根据这种理论,诗歌首先是舆论的工具,而感情和形式的美反而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也正因此,白居易的《新乐府》中不但存在着像《时世妆》那样使人想起我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刊上的批判牛仔裤文章的诗篇,即使是像《缭绫》一类反映民生疾苦、意存讽谏之作也因缺乏感情而不可能真正打动读者。这也就成为宋代大量出现的关注国计民生而其实平庸的诗篇的先声。

^① 马克思说:“爱情是一种情欲。”(见《神圣家族》中译本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对每个人来说,这当然是个人的情欲。